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29

2011年5月23日

劉少奇 1961 年湖南農村調查的特點和啓示

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王世遠

我們黨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並把它作為制定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根本方法。不管是順利的時候，還是困難的時候，都要進行調查研究，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規律。毛澤東同志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早已成為人們所熟知的名言。但他還有一句話：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也是歷史的箴言，應該為人們所牢記。劉少奇同志 1961 年的湖南農村調查，就是一次成功的“正確的調查”。

2011 年是劉少奇同志的這次調查 50 週年。1961 年 4 月 2 日到 5 月 15 日，少奇同志到湖南寧鄉、湘潭、長沙三縣農村，蹲點調查 44 天。讀到他當年調查的一些文獻史料，深深感到他的這次“正確的調查”，給人留下不少啓示。

50 年前，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

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還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以致出現了“大躍進”這樣的失誤，使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在困難面前，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1961年搞成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而且，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親自帶頭，以上率下。毛澤東同志組織和率領了三個調查組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同志也先後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全黨各級領導幹部都迅速行動起來，調查研究蔚然成風，為黨和國家解決當時面臨的問題，儘快度過難關，發揮了很大作用。

那麼，少奇同志在湖南農村的調查，有些什麼顯著特點和重要啟示呢？

第一，立場：真心誠意地尊重群眾，問計於民。

調查研究，首先要解決的是依靠誰的問題。依靠誰，反映的是調查研究的立場。立場對了，調查研究就不會是居高臨下，而會真正把自己擺在向群眾學習和請教的位置，誠心誠意地問計於民。

少奇同志的這次農村調查，可說是開宗明義。在保留下來的這次調查的文獻史料中，第一個文獻就是1961年4月13日少奇同志在天華大隊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他一開始就講：這次調查“是我們請教你們，向你們學習，到底是你們幫助我們，幫助中央，還是我們幫助你們？第一，是你們幫助我們；第二，才是我們幫助你們。你們不幫助縣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縣委的政策，就不會正確。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縣委也好，要靠你們幫助，就是說要靠老百姓幫助”。很明顯，搞調查，不是群眾有求於調查者，是調查者有求於群眾，有了這樣的立場，對群眾自然有一種敬畏謙虛之心，就會把深入基層，找群眾座談，看成是一種“學習”，看成是對群眾的一種“打攪”。所以，少奇同志在調查中總是說：“我到你們這裡來，也

是商量一些問題，恐怕我再來調查，就更麻煩，找你們問這樣，問那樣，你們春耕忙得很，要插田了。”“田裡工夫忙不忙？想耽誤你們半天的工夫，同你們談談”。

調查研究須有鮮明和強烈的問題意識，有了問題意識，才會把依靠群眾的調查立場和問計於民的調查目的，明確地銜接起來。少奇同志的這次調查，目的是為修改 1961 年 3 月中央工作會議制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他是怎樣向群眾傳達這一調查目的呢？在天華大隊幹部座談會上，他說：“《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寫得對不對，想來徵求你們的意見，看哪裡寫得不對，哪裡寫多了，哪裡寫少了。以前中央寫一些東西，發一些指示，沒有徵求你們的意見，常常發生錯誤，這次就來徵求你們的意見。”以這樣的態度問計於民，體現的是尊重群眾、依靠群眾和虛心向群眾學習的調研立場。

第二，方法：在“深入”上想辦法，下功夫。

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面對面地與群眾交談，是瞭解真實情況的前提，是人們常講的做好工作的必需途徑。但怎樣才算是“深入”呢？這就需要想些辦法、下些功夫了。

少奇同志在調查中，不滿足於一般地看材料、聽彙報、搞座談，而是採用多種方式。比如家庭訪問、約人個別談話、田頭聊天、突然檢查、看望病人、實地觀察、聘請信息員等。行前，他交代工作人員要輕裝簡從，發揚蘇區時期鋪禾草、自帶乾糧的工作方式，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不打擾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調查中，他先後在王家灣生產隊“萬頭豬場”的飼料房住了七天，在天華大隊陰冷潮濕的大隊部土磚房中住了 18 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別召開基層幹部和社員座談會，深入田間山林、鄉村醫所、公共食堂、社辦企業和農民家庭走訪。44 天的調查，他有 33 天吃住在農村，開了 20 多個座談會，走訪了 11 個生產隊，和基層幹部群眾個別談話上百次。他一家家調

查，揭開農民家的鍋蓋，嚐吃農民當作口糧的野菜和糠粃粃；他打開農民家的碗櫃，發現油鹽鑊子裡只有鹽，苦澀地說：油鹽鑊子名不副實啊。他甚至撥開人糞，查看農民吃的究竟是什麼，發現裡面儘是野菜等粗纖維。這樣的調查方式，使少奇同志準確地掌握了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比如，當時天華大隊是省、縣樹立的一面紅旗，調查前，少奇同志看到的材料上說，1960年天華大隊1324畝田，產糧120萬斤，除去國家徵購32萬斤，按全大隊1186人計算，人均742斤，生產搞得很好，群眾生活不錯。調查開始時，幹部在群眾中統一口徑，向調查組封鎖情況。但少奇同志從不少社員患水腫病、小孩得乾瘦病、婦女月經不調等現象中，感到材料和彙報有問題，就親自到農民家裡做說服工作，要他們打消顧慮，終於弄清了真實情況。如大隊的糧食產量，經核實，1960年實際只有72萬斤，虛報了48萬斤。這就為解決天華的問題打下了基礎。可見，在“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地沉下去，是瞭解真實情況，落實尊重群眾、問計於民立場的基本途徑。

第三，勇氣：不迴避矛盾，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通過調查研究掌握了實際情況還不夠，還要對發現的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斷，經過仔細和耐心的思想工作，推動人們或糾正錯誤，或想出新的辦法，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做到這點，既需要胸懷，也需要勇氣。

少奇同志在這次調查中，深切瞭解到農村公共食堂、供給制、糧食購留、住房等一系列問題上的真實情況和農民群眾的真實願望，寫了大量調查筆記。接下來該怎樣作出準確的判斷，怎樣向群眾表態，怎樣作出符合實際的處理決策呢？少奇同志的做法，大體分為這樣幾個層次。一是，凡是發現和證明前些年中央的一些決策是不對的，就勇於承擔領導責任，多次向群眾誠懇致歉，作自我批評。比如，在炭子沖幹部和社員會上，他說：回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的工作做不好，對你們不起。有的做法，是中央提倡

過的，如辦食堂，大辦萬頭豬場，因此根子還在中央，不過到了下邊就添油加醋了，如廢掉好田挖魚池，拆老百姓的房子。二是，發現明顯的具體的錯誤，果斷地予以糾正。在調查期間，少奇同志花了不少力氣，為被錯誤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撤職的天華大隊原黨總支書記段樹成平反，同時還為所謂“破壞耕牛案”而蒙冤多年的農民馮國全和他已經去世的父親恢復了名譽。三是，對一些重大問題，需要立刻表態或改正的，少奇同志既態度鮮明又注意避免武斷。比如，辦不辦公共食堂，是當時調查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天華大隊當時的黨支部書記彭梅秀等幹部，揹上“紅旗單位”的包袱，不同意解散食堂，滿腹情緒地認為“劉鬍子（指少奇同志——引註）不是來抓生產的，是來找岔子的”。少奇同志沒有責怪他們，而是用調查瞭解到的情況幫助他們認識辦食堂的利弊，指出願意辦的可以自願組織，不願意辦的也可以解散。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一起商量，打通了彭梅秀等人的思想，從而使天華大隊率先解散了公共食堂。隨後，為處理好公共食堂解散後的房子、炊具、蔬菜、自留地等具體問題，避免造成混亂，少奇同志又佈置天華一個一個生產隊地討論，拿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四是，對涉及省、地、縣範圍較廣的問題作決定，少奇同志還十分注意聽取省、地、縣各級幹部的意見，向他們通報情況，共同研究決策，並且通過他們公佈各項決定，把點上的經驗和做法推廣到面上去。比如，為確定超產部分的糧食購留比例，他與省委負責人進行了商量，最後敲定方案。關於自留地、自留山的定權發證工作，也是與長沙縣政府主要領導同志商定後，由他們出面辦理的。少奇同志在調查中解決問題的以上四種方式，既體現出實事求是的判斷，又展示出民主決策的胸懷，從而使人民群眾看到了黨和國家解決問題的勇氣和辦法，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力量。

第四，結果：總結經驗，提昇認識。

少奇同志的這次調查，圍繞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兩大主題，涉及公共食堂、調用社員東西、退賠、耕牛與農具、糧食產量與購留、供給制、鞏固國家集體與個人的所有制、社辦企業、手工業工人、基層幹部民主作風、農民告狀等問題。可以說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農村情況作了一次相當全面而又具體細緻的摸底。調查出真實、真知和真理。經過對湖南農村這些具體問題的調查，少奇同志不僅推動解決了當地農村的一些具體問題，而且對農民群眾的要求和願望有了切實的感受。為此，他在天華大隊提出了農民興家立業的“十個一”目標：“一棟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欄好豬；一群好家畜；一園好蔬菜；一塘好魚；一塊好山；一天三餐好飯菜；一人有幾套好衣服；房前屋後有一片好風景。”這個目標從小處著眼，反映了當時當地農民群眾在建設新農村問題上的認識水平，也為當地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規劃了一個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藍圖。少奇同志的這次調查收獲，更主要的，是對當時農村困難的嚴重程度和造成困難的原因，在整體認識和判斷上，深入了許多，對克服困難的辦法，心裡也更有了底。為此，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作了題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的講話，比較深刻地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並提出“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農業方面好轉了，工業就可以好轉，市場就可以好轉。”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總結時，還專門向與會同志介紹了少奇同志的湖南調查，並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學習。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少奇同志的報告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分析，就更深入和全面了，一共16條，涉及怎樣處理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的關係，怎樣處理“多快”與“好省”的關係，怎樣打牢農業的基礎地位、怎樣貫徹民主

集中制，以及反對平均主義，發展商品交換，計劃指標留有餘地，珍惜群眾精力等等。很明顯，這些分析和判斷，是在湖南農村和其他地方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得出來的，是對調查研究中獲得的認識的進一步提煉和提昇。

劉少奇同志的湖南農村調查，是全黨 1961 年大規模調查的一個縮影。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場大調查，不僅對統一全黨當時的認識，堅決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方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促進了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認識。毛澤東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在 1961 年全黨大調查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的農業 60 條、工業 70 條、商業 40 條、科學 14 條、高教 60 條、文藝八條等工作條例，便反映了我們黨在當時條件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

50 年過去了，世情、國情和黨情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並已成功地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現在進行調查研究的環境、條件、內容和途徑，雖然與過去相比已有許多的不同了，但是，調查研究在黨的領導工作、決策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並沒有改變。調查研究的方法永遠不會過時，就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一萬年也需要”。這是因為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認識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我們黨的任何決策部署和方針政策的形成與制定，從來不是關在房子裡能產生的，都要經過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同樣，在這些決策部署和方針政策形成與制定之後，對它們的檢驗和完善，也都要經過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才能知道它們正確不正確、完善不完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

下去”，統稱為走群眾路線。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走群眾路線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過程；調查研究的方法，就是群眾路線的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方法。因此，調查研究必然成為黨的領導工作、決策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的根本方法。

現在，人類已進入信息技術時代，反映社會信息的渠道、手段和方法，較之以往豐富多了，也先進、便捷多了。但是，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仍然是最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任何先進、便捷的獲取信息的技術手段，都代替不了同群眾面對面進行交談的調查研究方法。因為通過這種調查研究，既可以深入瞭解和感受群眾的疾苦與基層的實際情況，又可以仔細聽取群眾的呼聲、要求與願望；既可以瞭解和總結群眾對貫徹執行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的經驗與創造，又可以聽取群眾對黨和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既是上下情況的直接交流，又是彼此思想、認識和情感的直接溝通。歷史和現實的大量事實說明，凡是經常進行調查研究的領導幹部，他們對下情大都會瞭如指掌、成竹在胸，他們同群眾大都會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做決策、辦事情必然會立足實際、唯實是舉，必然會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總之，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領導工作和執政工作的重要法寶，它能保持領導機關、領導幹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它能確保正確制定和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它能防止我們在決策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中發生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本本主義等錯誤，即使出現了失誤也能迅速得以糾正。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反復告誡我們的箴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也就沒有決策權”；“調查研究是謀事之道、成事之基”。只要始終不渝地把調查研究這個重要法寶，堅持傳承下去、發揚光大下去，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就會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